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家族 

[英] 尼尔·弗格森◎著

NIALL FERGUSON

何正云◎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常振明

中信集团董事长

何帆

经济学家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张颐武

北京大学教授

北村

著名作家

吴稼祥

知名学者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倾情推荐

《纽约时报》畅销书

《商业周刊》年度十大畅销书之一

《华尔街日报》

内容充实，引人入胜……是一席盛宴。

《纽约时报》

引人入胜……他们迷人的故事此前一直在流传，但从未看到过如此权威的细节。

《商业周刊》

弗格森对于大量材料流畅而富有思想的整合，为我们呈现了一系列有活力的诱人故事。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上架建议 金融

ISBN 978-7-5086-3287-2



9 787508 632872 >

定价：69.00元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家族 

[英] 尼尔·弗格森◎著

何正云◎译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下) / (英) 弗格森著; 何正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6

书名原文: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ISBN 978-7-5086-3287-2

I. 罗… II. ①弗… ②何… III. ①金融—经济史—世界 ②金融家—家族—史料—世界 IV. ①F835.09
②K835.1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9534 号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by Niall Ferguson

Copyright © 1998 by Niall Fergus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下)

LUOSICHAI'ERDE JIAZU (XIA)

著 者: [英] 尼尔·弗格森

译 者: 何正云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8-395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287-2 / F · 2594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第一章	德意志、共和国、国债 (1870~1873 年) // 001
	俾斯麦在费里耶尔 // 012
	“解决问题的关键”：赔款 // 018
	借与贷 // 032
第二章	“高加索皇族” // 035
	第四代 // 039
	合伙人 // 052
	贵族身份与贵族态度 // 063
第三章	犹太问题 (1874~1885 年) // 079
	反犹太主义 // 083
	家族的反应 // 095

- 第四章 “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1874~1885年) // 109
- 帝国的金融政治：埃及 // 121
 - 其他的东方问题 // 130
 - 从投资到投兵 // 136
- 第五章 政党政治 // 145
- 自由主义追求 // 147
 - 政治斗争 // 152
 - 统一主义 // 157
 - 与政治家的关系 // 161
 - 法国的保守主义 // 166
- 第六章 帝国的风险与收益 (1885~1902年) // 171
- 非官方的帝国风险：巴林家族的危机 // 172
 - “坚定的单一本位主义者” // 181
 - 地下帝国 // 185
 - 罗德斯与罗斯柴尔德家族 // 191
 - 官方帝国主义的陷阱：布尔战争 // 200
- 第七章 金融与联盟 (1885~1906年) // 205
- 未能打起来的战争 // 207
 - 法俄同盟 // 212
 - 意大利 // 221
 - 英德友好 // 223
 - 协定的背景 // 233
 - 英俄对抗 // 240
 - 奥匈帝国 // 247
- 第八章 军事—经济的复杂交错 (1906~1914年) // 251
- 影响经济政治 // 259
 - 一场“恐怖的战争” // 272
- 第九章 战争与家族危机 (1915~1945年) // 283
- 第五代 // 286
 - 战争的影响 // 289
 - 《贝尔福宣言》 // 294

影响力的衰退 // 299

大崩溃 // 310

由辱骂到政治行动 // 316

后记 // 327

致谢 // 355

我希望现在这个世界至少应该意识到德国是什么。

迈耶·卡尔·冯·罗斯柴尔德

1870年9月1日

我还想补充的是法国国债是一种随时都能找到买主的债券……

阿方斯·德·罗斯柴尔德

1870年8月22日

第一章

德意志、共和国、国债 (1870~1873年)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从表面上看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场灾难。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各个银行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欧洲大战中身处直接对立的两个阵营中。在莫瑞兹·戈尔德施密特儿子的自传中，他回忆起了安塞尔姆在1870年时歇斯底里地狂喊：“我无法接受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我没有办法接受，就算要花费我成千上万古尔登——我也不允许！”但是，战争还是爆发了。甚至在普鲁士军队潮水般涌向法国首都的时候，巴黎的合伙人还是选择留在拉菲特大街“坚守自己的岗位”：尽管早就意识到法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而且波拿巴政权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阿方斯和居斯塔夫还是站在自己祖国一边。他们通过向法国提供战争借款，尽自己的能力提供金融支持，而且还试图应用他们在伦敦的影响力来推进法国外交目标的实现。至少两名年轻的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他们的兄弟埃德蒙和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在机动保安队中服役。普鲁士军队对费里耶尔的占领促进了这种认同。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70年9月的到来似乎毫不留情地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罗斯柴尔德的金融势力必须在普鲁士的“铁血统治”面前低头。

与此同时，迈耶·卡尔在法兰克福更加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看成是节节胜利一方的普鲁士人，而且还不仅仅是普鲁士，甚至是法国战败后出现的新日耳曼德意志。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标志，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加冕为“威廉皇帝”前夕，迈耶·卡尔被选为由北德联邦国民议会派出的向国王“表达忠心”的议会代表团成员。然而，迈耶·卡尔没有留下来参加加冕典礼活动——没有罗斯柴尔

德成员出现在安东·冯·维尔纳描述这个伟大时刻的作品《日耳曼帝国宣告成立》中欢呼的士兵和盛装的官员中。而且由于同样的道理，罗斯柴尔德家族似乎被新的而且喜欢炫耀武力的德意志给矮化了。

然而，或许法国战败中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地方——除了它战败的速度——是它被征服的速度。在1870年的某一个时间，似乎波拿巴政权的崩溃可能会让法国——或者说是巴黎——陷入与1792年和1848年曾经出现过的类似的革命泥沼之中。像甘姆贝塔这样的共和党人想通过发动群众来延长战争的那些徒劳努力似乎损害了“资产阶级”所有的物质成果。1871年1月最终达成的和平条款被榨走的不仅有领土——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有金融——50亿法郎的赔款。所有这些都把第三共和国变成了19世纪的魏玛共和国。反过来，经济的快速复苏使得法国提前还清了赔款，因此在1873年结束了德国对法国北方领土的占领。在同一年，维也纳和柏林的股票市场崩盘，使所有中欧国家陷入了经济衰退，让人们开始对俾斯麦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在这一次金融报复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结果是，他们在巴黎，而且在整个欧洲的势力似乎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毫无疑问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体系在西班牙王朝的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他们非常清楚马德里的国会考虑的候选人之一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的利奥波德。但是他们没有认真领会俾斯麦对候选人的支持程度所暗示的重要意义，他其实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知道俾斯麦并没有把他的决定透露给布雷希罗德，使得他的这位个人银行顾问一直到7月5日都还相信“政治领域不会制造不安”。有意思的是，他似乎还是给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点儿暗示。按照4月5日给纽考特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老俾”告诉迈耶·卡尔说：“来自西班牙的消息非常糟糕，而且那个国家的金融状况非常奇怪。”但是，如果这是对西班牙渐行渐近的经济危机的一个加密警告的话，迈耶·卡尔并没有能够把它破译出来。

同样，阿方斯也没有能够领会到格拉蒙特公爵在5月份时被任命为法国外交部长的这项任命所蕴涵的重要意义。格拉蒙特对事实上存在着的法—奥联盟的坚定信心使得他更加放心大胆地甘冒各种外交风险，而且冒险的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任，而他的前任在考虑处理与普鲁士的任何关系时，总是把英国的支持作为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当阿方斯听到了对格拉蒙特的任命后，他评论道：“从任何方面看，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动高兴，因为这个部门的领导中应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人，他应该足够聪明，不会一天老想着通过一些花架子尽力去为自己赢得名声。”几乎没有比这个评价更加错误的人物评价了，尽管事实是，公爵的儿子之后娶了一位罗斯柴尔德（迈

耶·卡尔的女儿玛格瑞塔)，使人们总是联想到他可能已经是这个家族的朋友的这种可能性。7月2日，迈耶·卡尔见到了法国驻柏林大使伯尼特迪，当时他正（与通常所见的那帮政治家和银行家一起）离开柏林到威尔巴德去乘船。迈耶·卡尔向纽考特报告说，他“很高兴能够在伟大的首都经过紧张的工作后偷点儿闲。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很好，并且说所有一切都十分有序，和平已经得到了保证”。

不仅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和平充满信心：英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月12日迎接新任外交部部长格兰威尔爵士时，给他报告说，“在他的长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外事务中能有如此长的平静期。”但是迈耶·卡尔7月2日的信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让我们具体了解了银行家们为什么对西班牙危机一点预感都没有。原因不只是正好处于休假期间，因为他还是每天都按时报送消息，而且与巴林兄弟银行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精神状态非常好”。在普鲁士地产信贷银行——这是法国与普鲁士经济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启动的前夕，迈耶·卡尔最为关心的是怎么样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到7月17日他才开始关注“西班牙这个麻烦”，而且就算此时，他仍信心满满地认为“不会出现对和平的严重干扰”。早期的伦敦金融城悲观主义者，比如亨利·拉斐尔在这种时候卖出债券似乎犯了人们常规的错误。然而，不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知的是，法国和普鲁士两国政府都已经处于一个下不来台的很严重的外交困境中，只有撕破脸刀兵相见才能够解围。

毫无疑问，俾斯麦决心坚决支持霍亨索伦的候选人，就算激怒法国也在所不惜。早在7月8日他就说过：“要动员全军进攻法国。”至少部分原因是他看到了对外政策的危机可以被用做化解内部的经济问题，与用普鲁士的方式对德国进行统一后引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所形成死结一种手段。例如，他在7月10日承认“从政治上看，进攻法国对解决我们目前的困境很有益处”。俾斯麦的困难是解决利奥波德的父亲卡尔·安顿的犹豫不决，而且，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不愿意就此事与法国发生争执。事实上，利奥波德在4月22日已经回绝了他的候选资格，只是在经过一番艰难的劝说之后，俾斯麦才扭转了局势。然而，又一个更大的困难出现了，当时一名马德里的译电员错误地翻译了西班牙使节所转达的利奥波德的承诺，这意味着议员们不用继续在议会里进行对利奥波德的选举，而是提前结束了会议，这个失误又引起了没有预料到的延误。

这是一场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战争：当他们于7月9日在巴德埃姆斯会面时，威廉明确地对伯尼特迪说，如果利奥波德再一次退出，他也不会反对，但是，后者给巴黎的电报中充满抚慰语气的那一部分却因为传送过程中的天气干扰而无法译读。当伯尼特迪第二天再次返回来纠缠威廉的时候，他仍然获得了觐见的机会。尽管

威廉拒绝了利奥波德退出的要求，但是他也当场表示这只是霍亨索伦·西格玛林根王族家族内部的事务，他通知了他在伦敦的大使魏特尔，向格拉蒙特表达了普鲁士的和平意愿。7月12日，卡尔·安顿宣布他的儿子最后决定不参与竞选。在他们次日于疗养花园室外举行的会议上，威廉认真地向伯尼特迪宣布：“很好，这是一个好消息，它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那天下午他更进一步告诉大使，他“以同意他参与竞争的时候同样的感觉和同样的程度”批准了利奥波德的退出，也就是“完整而且没有任何保留”。

当所有一切在埃姆斯发生的时候，俾斯麦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在这个轨道上”，尽管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德国的报纸做好了安排。一直到7月13日他才重新获得了对这个事件的控制权，当时他从埃姆斯接到了那封关于威廉与伯尼特迪会面情况要点的电报。俾斯麦改写这封用于公开发表的电报时正确地阐述了国王的观点，他不能承诺“永远都不再同意”重新提出的霍亨索伦候选资格，但是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因为法国的要求已经冒犯了他，因而威廉随后拒绝会见伯尼特迪。这当然不是原文的意思，而是算计用来羞辱格拉蒙特的。俾斯麦继续采用修改后的电报来作为反法宣传运动的基础，引导了国内以及国外的舆论。

因此，俾斯麦使普鲁士的政策比他表面上的主子所期望的还要具有攻击性。然而，对战争的谴责不能只贴在普鲁士的门上。法国从1869年3月起就表示了他们对霍亨索伦候选人的反对意见，但相关的消息于7月2~3日在巴黎传开之后，马上得到的反应就是战争渲染。居斯塔夫总结了法国的态度，说市场是“冷静的”，但是：

你无法想象今天早上这个新闻在公众和政府中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王子被命名为西班牙国王，而且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人们不惜与普鲁士一战。这里大家都在说这也是皇帝的意见，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机会来用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事情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了。

相应地，7月6日，法国政府批准了一个由格拉蒙特起草的火药味十足的声明，并在立法院进行了宣读。正如居斯塔夫所看到的，格拉蒙特的“暴力型的”语言是政府立场的真实反映：只有“国王坚决地否决”霍亨索伦候选资格这样的语言才可能让他们觉得满意，而且，如果利奥波德打算接受王冠，就会被认为是“宣战”。他重复到，“在这里，人们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且人们认为再也不会会有更好的让人拥护的理由来进行战争。”当居斯塔夫看到法国总理奥利维耶时，奥利维耶警告他法国将会采用“一切手段”来制止这个人的候选资格，“甚至战争，而且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战争的热情不会低于1789年的时候”。“皇帝将会得到他所想要的，”居斯塔

夫预言道，“他想要的就是由议会投票宣布的战争。”

法国朝这个方向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格拉蒙特在7月12日提出的坚决的主张——此时，利奥波德已经退出——伯尼特迪毫无道理地要求威廉“保证他不会再一次批准这个候选资格。”这种要求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威廉不可能给出这样的保证，而格拉蒙特一而再、再而三固执地要求伯尼特迪去做这样的尝试，意图很明显是想要激怒柏林，就像是要求给拿破仑三世写一封道歉信一样。以这样莽撞的方式，格拉蒙特不仅对于威廉对伯尼特迪最后抚慰的话语没有感到满意，甚至还抓住埃姆斯的电报作为战争口实，而且在7月14日下午获得了批准进行法国的战争动员，尽管没在拿破仑三世再一次捡起他惯用的解决所有外交难题的办法——召开议会会议之前。但是为时已晚，7月15日，奥利维耶和格拉蒙特向内阁提交了埃姆斯事件的说明，这份文件采用了与俾斯麦同样的歪曲事实手法，之后，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直到这个消息传到了柏林，威廉才同意在普鲁士进行动员。“法国决定进行一场论战。”迈耶·卡尔最后总结道。人们很难不同意，就算这是一场论战，也深受俾斯麦欢迎，而对法国而言是致命的。按照居斯塔夫的说法，法国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那么现在开战要比6个月后更有利”。

事实上，法国不仅比普鲁士表现得更加好斗，而且其实就是侵略者，正因为如此，英国决定了自己不干预的立场。与1867年的卢森堡危机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伦敦与可能的交战方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7月15日，拿破仑三世要求阿方斯给格莱德斯通传递一个信息，要求在保证霍亨索伦退出候选方面获得他的支持。纳蒂在7月6日一早到格莱德斯通位于查尔顿住宅区的家里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他，而且正好碰到他正准备离家到温莎去拜见女王，因此与他共同驱车去了火车站。按照莫雷的说法，“格莱德斯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不同意这个候选资格，但是他不会安排干预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这个结果有时候被认为打碎了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希望，但是这似乎更像是他们想要听到的。一个冷淡的反应可能正是所需要的，如果想要越来越莽撞的格拉蒙特有所节制的话。居斯塔夫希望英格兰“维护和平”，这就意味着在对普鲁士施压的同时也要对法国施压。“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对我们的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想让我们接受一个妥协。”他在7月11日写道，“但是与此同时，很不幸的是公众的情绪和国会都已经被点燃了。”因此，当霍亨索伦在7月12日退出候选竞争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银行给伦敦发出了另一份电报，充满乐观地说道：“法国满意了。”格莱德斯通在当天很晚的时候看到了这份文件。紧接着，格兰威尔给驻巴黎的大使莱翁斯发了电报，说法国事实上应该“很满意地而且是终结性地接受利奥波德王子退出候选名单”。

英国的压力对法国产生了一些效果：当莱翁斯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勒波奥夫将军要求所有预备役军人聚集的命令被部长会议否决，而且决定不把格拉蒙特所要求的不重新提出候选人选的保证看成是最后通牒。从这点上说，罗斯柴尔德的非正式调停表面上看再一次对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半小时之后，”居斯塔夫听到威廉在7月12日对利奥波德退出的无保留批准之后说，“宣战的命令可能就要发出，尽管这可能与皇帝的想法不符，他想发动战争，但是他应该对这个回应感到满意。因此，和平已经达成，或者说是战争已被推迟，因为我不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得很好。”迈耶·卡尔的缓和更是没有保留：“看起来似乎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令人满意，而欧洲战争的可怕灾难已经免除。我们为此感谢上帝……”第二天的幻灭感觉是不可言喻的，而且他们都不怀疑应该去谴责谁。就是这一天，战争爆发了，居斯塔夫提出了这种可能，认为法国可能会重新提出它以前的对比利时的计划。这次法国事件在伦敦成了最不讲信用的例子。

危机的经济后果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略，但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因为这对我们解释英国的不干预有着很大的帮助。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德国和法国的金融市场受影响的程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巴黎的情况不妙：霍亨索伦候选身份的消息一传出，国债的价格马上开始下滑，从6月4日的74.83跌到了7月9日的71.25，战争爆发后更是大跌至67.05。但是这些数据与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数据略有不同，在这些地方新发行的4.5%票面利率的普鲁士债券从93.5暴跌至77.3——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就是德国的危机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更加严重。尽管蒸发掉的流动性足以把两边的很多银行拖入困境，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基本没有什么麻烦。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西银行除了俄罗斯所欠的那笔巨款（3500万法郎）外，相对来说似乎很少有出现问题的债务，而法兰克福银行基本上可以说什么问题也没有。尽管迈耶·卡尔错过了一个俾斯麦特有的暗示，但是他还是“及时提高了警惕”。随着法国首次在斯匹切尔伦和弗罗希威勒受挫的消息慢慢得到证实，崩溃的当然是法国市场，而德国市场则重振了信心。相反，英国市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1870年5月至8月间，最大跌幅是3.6%。这与1866年时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奥匈帝国和普鲁士战争期间正好与伦敦的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契合，这一点很值得关注。（在1870年所出现的情况似乎是法国的资本从冲突出现的早期就开始流向伦敦——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因为尽管有政府的花言巧语，但是巴黎早就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另一个不能说没有意义的例证是格莱德斯通在7月18日的时候以90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500英镑的永续公债：这是一个人的，而且有事实根据的对英国不干涉政策所投出的信心票。

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因此以一种比对1866年事件更为中立的态度来看待发生在

欧洲大陆上的事件。在 1866 年的时候，普鲁士的表现似乎更接近于坏蛋角色。当在法国在色当被击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里确实存在着同情法国的情绪，而且由于阿方斯的妻子莉奥诺拉身处伦敦，使这种情绪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此外，或许还有列昂内尔要求提供普鲁士人残暴行径的详细情况，以及后来他在海外为法国伤兵和战俘的募捐善款转款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在色当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为法国战争准备所做的事情也比为普鲁士做的多：法国在英国购买饼干和咸肉时是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进行的融资，尽管政府票据的贴现比优惠条件要略差。另外，纽考特起初同意认购法国的各种战争贷款，而且如果需要，可以通过法兰西银行提供黄金，但是这些允诺最终没有采用，因为法国政府通过在国内出售短期国库券的方式为第一阶段的战争进行了融资。然而，到 8 月末政府提出了常规的战争贷款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兴趣已经大为减弱。当国防政府 1870 年秋寻求在伦敦筹集 1 000 万英镑的时候，它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很小的美国公司 J·S·摩根公司。

相反，迈耶·卡尔提供的普鲁士战争债券虽然在战争初期受到了冷遇，但是到 10 月份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却提出了认购 100 万塔勒的谈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汉森曼被派到伦敦去安排一项价值 5 100 万塔勒的 5 年期国库券的发行；债券的短期安排是一个准备向法国要求战争赔款的信号，虽然不一定说明赔偿的幅度。迈耶·卡尔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参与这个行动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的地位目前并不乐观，因为政府有权期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且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就是把这项工作留给了其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要去做一些事让你感到不快，或者说把你置于一个对不起我们的巴黎朋友的位置。因此，我希望如果汉森曼来拜访你，你能友好地接见他，并且告诉他他希望我怎么做……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向政府表明我们的作用的机会，其他人就会跳起来抢走这个机会，并让我们靠边站，特别是我将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如果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从英国获得资金，我就不会用所有这些琐事来麻烦你，而得到你关于怎样来尽力调和我们的利益与政府的意见和要求。我承认，如果斯罗德控制了普鲁士的业务，我会感到非常遗憾，我敢说，斯罗德所代表的是艾兰格尔以及他们那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因为我完全有一切的理由相信所有对（北德联邦）债券有兴趣的其他普鲁士银行都会参与到他的阵营，并对把我们挤出局的这个主意拍手称快。

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对公开参与到新贷款中颇感踌躇，但是介绍了汉森曼与伦敦市银行进行接触，迈耶·卡尔因此也利用海外贸易银行作为他参与的前导。

纽考特也帮助海外贸易银行充实了它的白银储备——这是这项贷款的主要目的之一。

这些金融方面的原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不愿意按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愿望来进行调停的原因。从战争伊始，阿方斯和居斯塔夫就敦促政府应该进行干预，来更早获得和平，希望他们与堂兄弟们能够一起再次成为进行和平沟通的渠道。但是，能促进这样一次干预的唯一的事件应该是法国的取胜，这会使比利时受到极大的威胁，一旦这种可能性消失，格莱德斯通以及他的部长们就会满足于让事情按共有的路径发展。其他可能存在的危险——俄罗斯和奥匈帝国也会开始渲染一场“大规模战争”——实际上从来都是唬人的：戈尔查科夫和贝斯特坚持他们的不干预政策（早在1869年9月就已经达成），并相继在7月13日和20日宣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甚至迪斯雷利对格莱德斯通似的不作为的批评也只起到了反作用，他没有看到抵御“德国革命”的真正理由。如果说是为拯救拿破仑三世，他不是刚把小说《罗泰尔》敬献给了奥尔良分子德奥梅勒公爵？最让阿方斯恶心的是《时报》——其编辑德莱恩与列昂内尔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在战争初期的时候表现出了强硬的反法立场。具体说来，报纸公布的伯尼特迪1866年提交给俾斯麦的协定草本似乎证实了法国对比利时另有所图的传闻。在1870年10月，格莱德斯通自己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匿名的文章，文章中他宣布“新的国家关系准则……公开谴责了法国的侵略行径”。当《时报》在同月改变了它的语调，为防止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而要求进行干预时，有一些人相信罗斯柴尔德将会采取行动。但是事实上，罗斯柴尔德为英国调停的任何努力最终都将注定一事无成。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经年，而且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假设或许也从另一方面鼓励了伦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

对于身处欧洲大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中立从来就不是一种可选的立场。迈耶·卡尔毫不迟疑地对最初的普鲁士战争贷款认购了100万塔勒，当这次公开认购只募集到政府拟筹集的1.2亿塔勒的一半时——德国在战争早期也充满疑虑的另一个表现——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参加汉森曼领导的再认购2070万塔勒的辛迪加（其中，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认购了300万）。普鲁士的胜利传到法兰克福时，卡尔无法掩饰自己俾斯麦式荣耀的喜悦。“我认为巴黎人可能被吓坏了，”他在弗罗希威勒胜利之后高兴地写道，“特别是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德国人居然可以这么轻松地打败他们。这里以及整个德国都充满了热情，而且不需要我说，你也可以想象得到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我一点都不怀疑，”一周之后他又写道，“德国军队将会大获全胜，一个持久的和平将会到来。与此同时，这里会有很多生意，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伟大的人生。”

由于传来的战事消息越来越好，他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刻。“我认为法国人没

有成功的机会，”他在8月27日宣称，“他们将会知道与德国民族，而且是与100万德国男人叫板的结果是什么。”与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色当传来的消息使他欣喜异常，并急切地增持他手里的政府债券。“一点儿都用不着怀疑，”他在11月23日宣称，“（德国）政府将在未来欧洲的交响乐团里坐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上”，“德国的强大和团结能够为世界和平作出比所有国家都大的贡献。”确实是，他和他的家族对于冲突中的人力成本并没有抱任何幻想：他出生于英国的妻子路易丝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为伤兵们建立的医院里“日夜”工作。他对普鲁士理由的正义性没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他抱怨过旅途的劳累，但他对能够应邀与其他议员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向德国皇帝表示庆贺”感到无上荣光。

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在巴黎却是另一番遭遇。詹姆斯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他们是法国公民，而且在他们的爱国情结中表现得更加谨小慎微。举个例子，在7月19日，阿方斯辞去了北德联邦驻法国的总领事职务。他们在8月份的战争贷款中认购了至少5000万法郎。从战争伊始，他和居斯塔夫就表达了“首战必定对法国军队有利”这样的期望。开始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成英国的外交调停；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反普鲁士的感情开始产生出冷静的爱国情绪。在费迪南德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堂兄弟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普鲁士、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在他们的观点和感情中，他们都是极端热忱的法国爱国分子，”他这样向伦敦报告，“加上教皇的天主教狂热。”埃德蒙以及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机动保安部队里服役；阿方斯在普鲁士人进攻的前夜也去参与守卫巴黎城墙；内森·詹姆斯，可能参与了11月30日巴黎南部的那次流产的特罗希“突围”。8月6日，梅里美听说“一名罗斯柴尔德”在8月份“带着他的行囊，肩背长棍面包，乘坐北方铁路公司的三等车厢离开巴黎，而他的银行持有这个铁路公司2000万的股份”。尽管确实有安塞尔姆在色当战役前夕返回维也纳，以及詹姆斯·爱德华的兄弟阿瑟在1870年年末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事实，但是上述说法仍然无法洗脱恶意谣传的痕迹。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并且在危机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像很多有钱的巴黎人那样贪生怕死。

对那些身处法国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从战争初期他们就看到了战败的明显迹象。战争爆发的时候，安塞尔姆碰巧就在巴黎，他对他的观点毫不隐瞒：“法国人充满了热情，但是普鲁士人有更高效的军事组织，而且后者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处于绝对优势。”阿方斯也很悲观。“酒杯已经斟满，”他在7月20日宣称，“很不幸我们必须喝了它，而这杯酒非常苦涩。”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眼里，法国做错事情的